

· 学术探索 ·
(辛亥革命与中国革命思想)

《学术界》(月刊)
总第 158 期 2011.7
ACADEMICS
No. 7 Jul. 2011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

○ 李维武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 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 从而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 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 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 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 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 其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 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 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

(关键词) 辛亥革命; 三民主义; 汤武革命; 民族革命; 政治革命; 国民革命; 社会革命; 邹容; 孙中山; 陈天华; 朱执信

1901 年至 1910 年, 是 20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也是作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十年。从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世界看,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与 19 世纪最后十年相比, 时代的主旋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呈现出鲜明的不同: 如果说 19 世纪最后十年的主旋律是“维新”, 那么 20 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主旋律则是“革命”。1910 年, 当时是革命党人的汪精卫在《论革命之趋势》一文中曾对这

作者简介: 李维武(1949—), 哲学博士,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主要研究方向是 19—20 世纪中国哲学。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儒学形态与功能的近百年变化与未来展望”(09&ZD06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9—20 世纪中国哲学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05JJDZH243) 的阶段性成果。

十年间的中国思想走向作过如是描述“盖自庚子以来,革命之说,日炽于神州,有志者仓皇奔走,于外为鼓吹,于内为秘密之组织,所唯日孜孜者,革命之进行而已”⁽¹⁾;当时在檀香山从事革命新闻工作的卢信在《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一文中也有过类似的回顾“十年以来,革命风潮,日进千丈”⁽²⁾。正是中国人在观念上的这种大转变大飞跃,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而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凸显,又是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这一时期的形成直接相联系的。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以中国古代革命观念不曾有过的新的内涵与新的意义,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理想与新的希望,才改变了时代的主旋律,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而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除了时代条件、世界大势、中国时局等社会历史因素外,还在于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在这十年间对中西古今革命观念的吸取、融会与重构,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如果套用今天的话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形成,是当时的中国革命派思想家“解放思想”、“综合创新”的结果。在这里,即环绕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这一主线,对其主要环节与基本进程加以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探讨,进而揭示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内涵与意义,并由此来看辛亥革命对近百年中国思想世界所投下的深刻影响。

一、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复活

“革命”一词,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先秦典籍中就已出现,可谓古已有之。“革命”一词的本意,是指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天命所授予的国家政治权力由原来的统治者向新的统治者的转移。这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就表现为改朝换代。在《易·彖传·革》中,第一次把“革”与“命”二字合为“革命”一词,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在这里,不仅首次出现了“革命”一词,而且把商汤王、周武王这些历史上的圣王作为“革命”的典型,强调这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顺天应人,论证了通过激烈方式的变革实现改朝换代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环绕由革命引起的改朝换代问题,先秦时代的儒家思想家有进一步的思考与论说,从而形成了更完备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特别是孟子的一些政治哲学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等内容,被后人看作是对这种革命观念的具体阐发和进一步深化,认为“在二千年以前,已经肯定了政治的革命权利及人民对统治者的报复权利或将人君加以更换的权利”⁽³⁾。

这种古代革命观念在二千年间长期影响着中国人,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有研究者根据“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进行史料词语检索,得出结论说“戊戌变法之前,中国人都是在传统意义上使用‘革命’一词,常见的是‘汤武

革命’或者用于指外国、特别是法国的革命事件,且多有贬义,有时为中性。”⁽⁴⁾正是这样,当革命派思想家登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政治舞台和思想舞台时,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由于历史久远、深入人心、易于为广大下层民众所接受,首先受到了他们的高度重视和大力宣传,他们力图在新时代复活这一古老的观念,以此来唤醒民众走向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在他们论述革命的文章中,在他们鼓吹革命的宣传品中,就往往包含着中国古代革命观念。

特别是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具有强烈汉民族意识的革命者,不仅力主传统的华夷之辨,大胆否定清王朝统治的正统地位,而且倡导中国古代革命观念,激烈呼唤以革命方式实现反满兴汉的国家政治权力转移。例如章太炎,1901年在《正仇满论》中说“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⁵⁾,1903年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⁶⁾。他所讲的“革命”,便带有鲜明的传统印记,实为从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出发的改朝换代,所凸显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由满族统治者转移到汉族统治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就使得重新复活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首先是与“民族革命”、“种族革命”相联系,这成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革命最初的理解。

值得重视的是,一些明确认同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的革命派思想家,也在宣传革命时少不了带有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色彩,邹容、陈天华、胡汉民乃至孙中山都是如此。

1903年,邹容鼓吹革命的名著《革命军》问世。邹容在书中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但所阐发的革命理论中,仍然保留着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内容与影响。他在论述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⁷⁾这里的“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显然来自《易传》所提出和解释的中国古代革命观念。

陈天华鼓吹革命的名篇《警世钟》也在1903年问世。陈天华在文中依孟子之言,强调了百姓推翻昏君、另立新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指出“任凭什么昏君,把百姓害到尽头,做百姓的总不能出来说句话。不知孟夫子说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若是不好,百姓尽可另立一个。”⁽⁸⁾1904—1905年,陈天华又写了宣传革命的通俗读物《狮子吼》。其中第三回《民权村始祖垂训,聚英馆老儒讲书》通过老儒文明种之口,讲出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现代意义。他写道,文明种对学生们说“不论做君的,做官的,做百姓的,都要时时刻刻以替国家出力为心,不可仅顾一己。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其中一位学生闻此语大惊,问道“怎么皇帝都可以杀得的!不怕悖了圣人的训吗?”文明种的回答是“《书经》上‘无我则后,虐我则仇’的话,不是

圣人所讲的吗? 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话,又不是圣人所讲的吗? 一部五经四书,那里有君可虐民,民不能弑君的话? 难道这些书你都没有读过吗?”⁽⁹⁾

1910年,胡汉民发表《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一文。文中直接引用了“汤武革命”中牧野之战的例子,号召清王朝军人学习当年商王朝军队,在前线倒戈以促成以周代商革命的胜利。他说“俟革命军起而响应之,其助动之力亦至大。古人有行之者,牧野之战,前徒倒戈攻其后以北,血流漂杵。以军人而响应革命,为我国革命战史最有光荣之事。”⁽¹⁰⁾在他看来,这种古代军人的光荣革命传统,尤其值得在反清革命中加以继承和发扬。

孙中山自倡导革命起即以民主共和国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为其目标,但他又往往借用儒家经典中的革命观念来宣传革命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赢得民众、动员民众。1903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发表演说,鼓吹革命,即称“首事革命者,如汤武之伐罪吊民,故今人称之为圣人。今日之中国何以必须革命? 因中国之积弱已见之于义和团一役,二万洋兵攻破北京。若吾辈四万万人民一齐奋起,其将奈我何! 我们必要倾覆满洲政府,建设民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¹¹⁾1904年初,孙中山在《驳保皇报书》中,对檀香山保皇派报纸所刊《敬告保皇会同志书》痛加批驳,指出“彼曰‘革命之说,原本《大易》。’又曰‘中国固始终不能免于革命。’其言是矣,乃何以又曰‘中国今民智为萌芽时代’? 夫《大易》者,中国最古之书。孔子系辞,称汤武革命,顺乎天也。岂由汤武至于今,经二十余朝之革命,而犹得谓之萌芽时代耶?”⁽¹²⁾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谈到“革命之主义”时仍追溯到孔子,说“革命之名词,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以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中国古昔有唐虞之揖让,汤武之革命,其垂为学说者,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有所谓‘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其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¹³⁾

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对于动员中国人投身反清革命,在现实中起过十分积极的作用。一些下层知识分子,正是基于“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激发,而投身反清革命。在湖北革命党人所写辛亥首义回忆录中,就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例如,殷子衡在回忆自己投身革命的动机时就说过“少年读《易经》至《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书经·汤誓》说‘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说‘令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都能激发人的革命思想。这一类的话给我的影响很深,使我觉得吊民伐罪是人人应该做的一件大事。”⁽¹⁴⁾又如,方孝纯在回忆武昌新军中革命思想传播时亦说“一九〇七年(光绪丁未)春天,我在陆军小学(后更名陆军特别小学堂)肄业,与同学郑挽澜、梅治逸、武丹书游学校内之花园,就草地盘膝而坐,颇怀畅谈。挽澜谓‘古称汤武革命,应天

顺人。今革清廷之命，正是应天顺人。我等要拿出胆略，早事布置。”⁽¹⁵⁾从这些回忆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对辛亥革命的发动，确有积极促成作用。

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所投下的这些影响，不仅唤起了中国人以改朝换代的激烈方式革新中国的意识，而且引导中国人引入和接受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从而最终形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人用汉语中古老的“革命”一词翻译英语中的“Revolution”一词，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并不具有现代性的因素，却成为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来源与先导。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并不具有现代性的中国传统观念，在中国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中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9世纪最后十年中，公羊三世说曾对“维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起过积极作用；那么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对于“革命”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亦曾起过积极作用。也正是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中，实包含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中这些在20世纪中国仍有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因素。

二、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的引入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中国古代革命观念尽管影响很大，但毕竟由于时代已经大变、中国历史文化已经大变，因而难以适应这大变之世，不可能成为在20世纪中国进行革命的思想旗帜。这一点，革命派思想家都有程度不同的认识。秦力山于1905年发表的《革命箴言》第十一章《革命问答》中，首先有一番问答，即将这一问题说得很明白：“问：革命之名词，始于《周易》（《革卦》：‘汤武革命’），而殷周以来君统易姓者已非一家，然则前代所有之禅让篡争，皆可以谓之革命乎？答：西国史家于中古王朝之更易，亦特书曰革命。然自近世革命之风盛行，各国大率皆至宪法成立后，而一国之基础确定，而臣民之篡夺与列邦之覬覦者，亦由是断绝，故世之历史与政府法律学上之所谓革命者，其字虽与昔之更换朝代者相同，而其性质实有所异，盖改易政体之专名也。”⁽¹⁶⁾这就强调了“近世革命”在于“改易政体”、建立民主宪政，而不是“汤武革命”意义下的“君统易姓”、“更换朝代”，因此这两种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尽管都称为“革命”，但其性质却是全然不相同的。即使是章太炎也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他在为邹容《革命军》所写序言中已经对这一感受作了表达，指出邹容以“革命”命名其书自有其新意：“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¹⁷⁾正是这样，与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相比，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思想世界受到了更多的重视，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对中国思想世界发生影响的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例子，

是中国人开始把汉语中的“革命”一词与英语中的“Revolution”一词联系起来,以“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从而赋予“革命”一词以新的含义,由原指中国古代的改朝换代,转化为近代意义的社会制度变革。对于“革命”含义的这一现代转化,梁启超作为维新派思想家并不很赞成,认为这样一来不合乎汉语中的“革命”一词的本义。1902年,他发表《释革》一文,指出汉语中的“革”字含有英语的“Reform”与“Revolution”二义,这二词在英语中所指的历史现象是不相同的:“Reform者,因其所固有而损益之以迁于善,如英国国会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改革、曰革新。Revolution者,若转轮然,从根柢处掀翻之,而别造一新世界,如法国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之Revolution是也,日本人译之曰革命。”⁽¹⁸⁾而汉语中的“革命”,皆指王朝易姓而言,与“Revolution”并不是一回事。以“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就会使得“近今泰西文明思想上所谓以仁易暴之Revolution,与中国前古野蛮争阅界所谓以暴易暴之革命,遂变为同一之名词,深入人人之脑中不可拔”⁽¹⁹⁾。而革命派思想家,则力主在“Revolution”意义上来理解“革命”。秦力山在《革命箴言》中就明确地把“革命”与“Revolution”联系起来,指出“革命云者,英语谓之Revolution,犹之乎星辰日月之运行,春夏秋冬之代谢,与反叛二字绝不相混,而为一独立之名词。英语之反叛为Punopoy,吾人若以革命为反叛,则大误也。”⁽²⁰⁾1907年,李石曾发表《革命》一文,则干脆否认了中国自古本有“革命”之说,认为“革命之名词来自西文,其字作Revolution。”⁽²¹⁾这就使得西方近代革命观念更为鲜明地凸显出来,逐渐演变成对革命的一种主要理解。

随着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的引入,革命派思想家对革命的理解也由之而逐步深化。秦力山在《革命箴言》中即指出,“革命”一词包括了广义与狭义两种含义“其广义为何?今试有一物于此,其全体尚未破坏,而有一部分之丧失或糜烂,吾人为弥补之,或更易之,使成一完全之物,是之谓改良。有一物于此,其全体皆腐败,或腐败其大半,今欲修补之,反不如更张之,其资力既省,而效力益神,于是乎弃此而另置一物,其义直同于革命。今略数其事,路德以旧教之腐败,起而号呼奔走,创立新教,于是有宗教革命;华盛顿以美利坚不堪母国之压制,不惮艰难险阻,脱专制之羁绊,以建立共和国制度,于是有君主革命。年代愈降,公理日昌,万事尽新,文明渐启。气机出,而工艺革命;解剖兴,而医学革命;论理学明,而文学革命;均产说起,而社会革命;轮舟铁道出,而交通革命。……其狭义为何?曰:国家者,一政治团体之脑海也。今之政治学家,既公认国家为一有机体,则犹之一人焉,耳目百体之灵蠢强弱,直以一脑而担负其责任。故近世各国制度、学术、工艺、军事、交通、美术等,以及百般文明机关之发生,皆在于君权革命(此言君权革命而不曰君主革命者,含日本、英、德、意、奥等国在内)以还。吾人当二十世纪竞争剧烈之秋,若欲希望种族与国家之生存,则一国之文物制度,自不得不因新理而革命旧谬。然苟欲达此目的,则不得不先去其障害之物。其物维何?则现政府是也。……苟旧政府去,则支那一蹶而跻无上上雄之国

矣。”⁽²²⁾在这里,不论广义的革命还是狭义的革命,都与进化和革新相联系,是一种破旧立新、以新代旧的合理变动。特别是狭义的革命,即国家政治权力的转移,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不再是以好君主代替坏君主的历史循环,而是通过近代意义的“君权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或实行君主立宪,从国家制度上结束君主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这里的“君权革命”在当时更多地被称为“民权革命”或“政治革命”。这样一来,革命派思想家对革命的理解,远远超越了中国传统的“汤武革命”,而具有了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为样板的近代内容。这是中国革命观念实现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一大关节点。

需要指出的,促成中国革命观念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换的动力,不完全来自革命派思想家,还在于进入20世纪后维新派与革命派之间的相互辩难、激烈论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继续幻想走维新立宪的道路,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用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否定法国大革命。康有为在1902年春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在这一点上最具有代表性。他在文中对近代欧洲各国政治进行了比较,认为“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富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统计欧洲十六国,除法国一国为革命,实与俄之一国为专制者同,皆欧洲特别之情。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然法倡革命,大乱八十年,流血数百万,而所言革命民权之人,旋即借以自为君主而行其压制,如拿破仑者,凡两世矣。然使法国之制独善,法国之力独强,法民之乐更甚,由之可也。今各国之宪法,以法国为最不善,国既民主,亦不能强,能革其君,而不能革其世爵之官,其官之贪酷压民甚至,民之乐利,反不能如欧洲各国。此则近百年来欧洲言革命不革命之明效大验矣。”⁽²³⁾针对康有为对法国大革命的否定,革命派思想家则竭力肯定法国大革命。陈天华写于1903年夏的《猛回头》,就有一节题为《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以民众易懂的语言为法国大革命进行辩护:“列位!你看如今那个不赞道法兰西的人民享自由的福。谁晓得他当二百年以前,受那昏君赃官的压制,也与我现在一样。法兰西通国只有中国一二省大,却有十三万家的贵族,都与那国王狼狈为奸,把百姓如泥似土的任意凌践。当明朝年间,法国出了一个名儒,名号卢骚(即卢梭——引者注),是天生下来救渡普世界的人民的,自幼就有扶弱抑强的志气。及长,著了一书,叫做《民约论》,说道这国家是由人民集合而成,公请一个人做国王,替人民办事,这人民就是一国的主人,这国王就是人民的公奴隶。国王若有负人民的委任,这人民可任意调换。法国的人先前把国认做是国王的,自己当做奴隶看待,任凭国王残虐,也不敢怨;闻了卢骚这一番言语,如梦初醒,遂与国王争起政来。国王极力镇压,把民党杀了无数。谁知越杀越多,一连革了七八次命,前后数十年,终把那害民的国王贵族,除得干干净净,建设共和政府,公举一人当大统领,七年一换。又把那立法的权柄归到众议院来了,议员都从民间公举。从前的种种虐民的弊政一点没有,利民的善策件件做

到。这法兰西的人民好不自由快乐吗！人人都追想卢骚的功劳，在法国京城巴黎为卢骚铸一个大大的铜像，万民瞻仰，真可羨呀！”⁽²⁴⁾对于法国大革命，这种“糟得很”的议论与“好得很”的赞扬，可谓针锋相对！正是通过这些相反之论，把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在中国人面前鲜明地凸显出来。

三、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初步提出

随着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的引入，革命派思想家初步思考并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使西方近代革命观念开始与中国人反清革命实践进一步结合，在中国具体化为与“民族革命”主张相并行、相配合的“民权革命”主张。在这方面，年轻而激进的革命派思想家邹容可以说是先行者，为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初步提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03年，邹容的名著《革命军》在上海出版，由此而在中国境内掀起了革命思潮。《革命军》之所以能在中国思想世界产生巨大而持久的影响，首先当然在于它在中国大地上发出了惊天动地的革命呼声。在该书的《绪论》中，邹容感慨陈词“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颧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²⁵⁾这呼声之强烈、之激愤，是中国自有“革命”一词以来所未有过的，震撼了中国思想世界，激发了先进中国人以革命手段再造中国的理想与激情。

然而，邹容所呼唤的革命，不仅是指“民族革命”，而且是指“民权革命”。在《革命军》中，他固然强调“民族革命”，力主“革命必剖清人种”⁽²⁶⁾，高喊“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²⁷⁾，甚至提出“驱逐住居中国中之满洲人，或杀以报仇”⁽²⁸⁾，但他更要说明的，在于以“民权革命”终结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在中国建立新式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他所说的“今既革命独立，而犹为专制政体所苦，则万万不得甘心者矣，此所以不得不变昔日之政体也。”⁽²⁹⁾他在书中尽管没有使用“民权革命”、“政治革命”等概念，但却通过对西方近代革命观念的吸取与宣扬，并结合中国的实际状况，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阐发了这一革命的目的、根据、性质、理论和前途，从而鲜明地举起了“民权革命”的旗帜。

关于革命目的。在《革命军》的开篇，邹容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革命的目的“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命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³⁰⁾

在这里,他除了主张“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外,更强调“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从而提出了反清革命的双重目的:既推翻满族在中国二百多年的统治,又结束中国数千年君主专制制度。前者是“民族革命”的目的,后者则是“民权革命”的目的。

关于革命根据。在《革命军》中,邹容虽然也痛陈清朝统治者对内的压迫剥削和对外的丧权卖国,以此论证革命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更主要的是引入西方近代天赋人权理论,以恢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平等自由权利,说明革命的原因和革命的理由。他说“人人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有生之初,无人不自由,即无人不平等,初无所谓君也,所谓臣也。若尧舜,若禹稷,其能尽义务于同胞,开莫大之利益,以孝敬于同胞,故吾同胞视之为代表,尊之为君,实不过一团体之头领耳。而平等自由也自若。后世之人,不知此意,一任无数之民贼、独夫、大寇、巨盗,举众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为一家一姓之私产,而自尊曰君,曰皇帝,使天下之人无一平等,无一自由,甚至使成吉思汗、觉罗福临等,以游牧贱族,入主我中国,以羞我始祖黄帝于九原。故我同胞今日之革命,当共逐君临我之异种,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以立于性天智日之下,以与我同胞熙熙攘攘,游幸于平等自由城郭之中。”⁽³¹⁾这就把反清革命的根据,不再局限于满汉民族矛盾,而归结到保障人的平等自由权利,归结到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私天下,从而使反清革命获得了更为普遍性的根据。

关于革命性质。邹容在《革命军》中写道“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为世界应乎天而顺乎人之革命,去腐败而存良善之革命,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吾是以于我祖国中,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指点二千余万方里之地图,问人省己,欲求一革命之事,以比例乎英、法、美者。呜呼!何不一遇也!”⁽³²⁾在这里,他认为真正顺天应人的革命,不是中国古代的“汤武革命”,而是发生在17—19世纪的英、美、法诸国革命。这些革命,都是用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旧的封建主义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未曾出现过的。在他看来,中国所要进行的革命,也正是类似英、美、法的以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而不是重复中国历史中已经重复许多次的改朝换代。

关于革命理论。邹容在《革命军》中提出,要学习西方诸国革命,切实有效地进行中国革命,就必须将西方近代政治哲学及政治思想译介到中国来,作为革命的理论根据和思想指导。他写道“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文明之革命也;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弥勒约翰《自由之理》、《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等书译而读之也。……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金丹换骨,刀圭奏效,法、美文明之胚胎,皆基于是。我祖国今日病

矣 死矣 岂不欲食灵药、投宝方而生乎? 若其欲之, 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幡, 以招展于我神州土。”⁽³³⁾ 以“卢梭诸大哲之宝幡”所引导的革命, 当然不再是君主专制制度下的改朝换代, 而是进行类似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近代革命。

关于革命前途。在经历了以新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旧的封建主义制度的革命之后, 应当建设一个怎样的新的中国呢? 这是邹容在《革命军》中着重探讨和阐明的。在书中第六章《革命独立之大义》中, 他对新的中国进行了政治设计, 强调新的中国不应再是君主专制的国家, 也不应成为君主立宪的国家, 而必须是民主共和国, 并明确提出了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构想: 这个新的中国的国名, “定名中华共和国”⁽³⁴⁾; 这个新的中国的性质, “为自由独立之国”⁽³⁵⁾; 在这个新的中国内,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³⁶⁾, 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凡为国人, 男女一律平等, 无上下贵贱之分”⁽³⁷⁾; 各人的权利, 都是与生俱来的, “生命, 自由, 及一切利益之事, 皆属天赋之权利”⁽³⁸⁾; 正是这样, “各人权利必要保护。须经人民公许, 建设政府, 而各假以权, 专掌保护人民权利之事”⁽³⁹⁾; 也正是这样, “无论何时, 政府所为, 有干犯人民权利之事, 人民即可革命, 推倒旧日之政府, 而求遂其安全康乐之心。迨其既得安全康乐之后, 经承公议, 整顿权利, 更立新政府, 亦为人民应有之权利。”⁽⁴⁰⁾ 总之, 未来的新的中国, 应当是一个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制国家。

对于邹容《革命军》的这一思想特点, 当时主笔《苏报》的章士钊看得清清楚楚。他以“爱读《革命军》者”的笔名, 在《苏报》上发表《读〈革命军〉》一文, 对邹容《革命军》的革命观念予以解读, 指出“卓哉! 邹氏之《革命军》也, 以国民主义为干, 以仇满为用, 捋扯往事, 根极公理, 驱以犀利之笔, 达以浅直之词。”⁽⁴¹⁾ 这里的“国民主义”, 即“民权革命”观念; 这里的“仇满”, 则是指“民族革命”主张。在章士钊看来, 只有“国民主义”才是《革命军》的根本主张, 而“仇满”则是为“国民主义”创造前提、开辟道路。因此, 《革命军》一方面“捋扯往事”, 揭露了满汉民族间的历史结怨, 另一方面则“根极公理”, 阐明了反清革命的真正追求。对此, 他在文中说“然使仅仅以仇满为目的, 而不灌输以国民主义, 则风潮所及, 将使人人有自命稟政、朱元璋之志, 而侥幸集事, 自相奴畜, 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⁴²⁾ 章士钊的这些看法, 可谓入木三分之见、一语破的之论, 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 而且在百年之后仍对《革命军》研究者有指示作用。

总之, 邹容在《革命军》中有关革命的目的、根据、性质、理论、前途诸论述, 初步提出了中国民主革命纲领, 是中国人革命观念的一次历史性更新。正是这样, 《革命军》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启迪人心的启蒙作用, 促使革命派思想家在鼓吹“民族革命”的同时开始鲜明地举起“民权革命”的旗帜。在1903年出版的《黄帝魂》一书中, 收有《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一文, 文章“述者曰”中就提出了“民权革命”⁽⁴³⁾ 概念。1905年, 孙中山更明确地把革命目标由反满移向民权, 提出“革命以民权为目的”, “革命之志在获民权”⁽⁴⁴⁾。而在1904年孙

中山向美国人民作呼吁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他指出“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⁴⁵⁾邹容的《革命军》,显然正是这一计划的代表作。在半个多世纪后,毛泽东还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谈到“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⁴⁶⁾因此,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过程中,邹容是一个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思想家。他的《革命军》构成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转换为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由强调“民族革命”发展至强调“民权革命”的重要一环。

四、三民主义的完整提出及对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发展

邹容在《革命军》中所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固然意义重大、影响巨大,但也有其局限性。其中一个很大的不足,就在于把革命根据放在具有普遍性的人的权利上,而对广大下层民众的民生问题缺乏关注,忽视了他们的特殊革命要求。把民生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纲领中凸显出来,进而提出“社会革命”的主张,使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包括了“民族革命”、“民权革命”、“社会革命”三方面内容,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先行者孙中山的历史性贡献,在他所提出的三民主义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三民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孙中山1894年秋在创立兴中会时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⁴⁷⁾的纲领,在这个纲领里已经包含了后来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中进一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⁴⁸⁾的主张,这在强调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基本内涵的同时,又包含了民生主义的基本内涵,形成了完整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内涵。1904年,孙中山为支持反清革命的美洲洪门致公堂重新制订章程,把这一主张写入其纲领中。1905年,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又将这一主张纳入同盟会总章。在同年11月出版的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把这一主张第一次明确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1906年,孙中山在《军政府宣言》及庆祝《民报》创刊一周年的演说中,更从理论上对三民主义作了系统的阐发,使之成为反清革命的理论纲领和思想旗帜。至此,以孙中山为领袖的革命派终于有了自己的明确的政治哲学和指导思想。

根据孙中山的阐释,所谓民族主义在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⁴⁹⁾所谓民权主义在于:“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⁵⁰⁾所谓民生主义在于:“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

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⁵¹⁾三民主义集中体现了孙中山的革命总目的，体现了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革命追求，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由此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具有了更完整的内涵和更长远的目标。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⁵²⁾这样一来，孙中山就明确地提出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类革命观念，并将这三类革命观念结合在一起作为统一的革命目的。这里的“政治革命”，也就是“民权革命”，此后革命派思想家更多地用“政治革命”来表达“民权革命”。

在孙中山看来，在当前反清革命中，实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提倡民生主义同样不可或缺，特别是对“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胜利后建立新的中国更为重要。因此，他所主张的革命，不仅包括“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而且包括“社会革命”。他希望在实现“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后，通过实行民生主义，能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从而使“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在《〈民报〉发刊词》中，他即对这一主张作了明确的说明：“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而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未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近时志士舌敝唇枯，唯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⁵³⁾在他看来，以实现民生主义，“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从而避免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无疑是三民主义中最富有远见的内容。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完整提出，对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从主张“民族革命”到重视“政治革命”再到提出“社会革命”，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可谓步步发展、层层深化、逐渐丰富而充实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最初地位凸显的“民族革命”，逐渐让出位置给“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这一革命观念的变化，在革命派思想家的革命宣传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1910年，卢信在《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一文中，即从三民主义出发，对同盟会的革命主张作了更具体更完整的论述：“吾党主张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何谓民族主义？

颠覆异族之专制政府而恢复我民族之自由。何谓民权主义？设立适宜之政府，扩张人民之权利。何谓民生主义？实行社会主义，使一般人民得有平等之地位。此三大主义者相维相系，缺一不可，若徒支离灭裂取其一枝一节而行之，不特无效，适以贻害者也。首言民族主义，则满清之异族专制政府，不能不排；次言民权主义，无论满清为异族政府，固所必排，即为汉人政府，而君主专制，尤不能不起而革命；三言民生主义，即使共和政治成立，然社会不平，下级人民失其生活之地位，则社会革命仍不能免。”⁽⁵⁴⁾因此，他把革命的目的归结为“夫革命者，所以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求自由幸福者也。”⁽⁵⁵⁾

尽管孙中山把民生主义的实行放到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胜利之后，但民生主义及“社会革命”的提出，对于指导当时的反清革命仍有重要意义，使得革命派思想家关注广大的下层民众，力主通过革命思想的灌输，唤起他们的革命意识。陈天华在《绝命辞》中即言“今日唯有使中等社会皆知革命主义，渐普及下等社会。斯时也，一夫发难，万众响应，其于事何难焉。若多数犹未明此义，而即实行，恐未足以救中国，而转以乱中国也。”⁽⁵⁶⁾杨毓麟在《新湖南》中更明确指出，湖南革命知识分子的责任在于：“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者，唯诸君之责；破坏上等社会以卵翼下等社会者，亦为诸君之责。下等社会吾亟亟与之言，故必亟亟与诸君言；上等社会吾不屑与之言，尤不得不亟亟与诸君言。”⁽⁵⁷⁾朱执信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往代揭竿之事，多起于经济之困难，于汉、唐、明之末季尤著，此最当注意之点也。……今后革命，固不纯恃会党，顾其力亦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⁵⁸⁾在这里，他们都提出要关注“下层社会”、“下等社会”乃至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细民”，从而在革命观念中凸显了直接与广大下层民众相沟通的内容。这些内容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进一步开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位置。

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对“社会革命”的关注，使得他们进而关注社会主义、关注马克思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思想世界传播，而这一时期中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最有力者，正是这一批孙中山的追随者。他们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则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点在本文第六节和第七节中将作专门说明。

五、区分“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

随着三民主义的完整提出和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发展，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开始对正在进行的反清革命进行反思，开始自觉地把他们所开展的革命运动与中国古代革命运动区分开来。1905年，陈天华在《民报》上发表《中国革命史论》一文，就对这一问题作了专门阐发。

在文中，陈天华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革命进行了深入剖析，指出这些革命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可分为“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两种不同的类型。他说：“有国民之革命，有英雄之革命。革命而出于国民也，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

共和 其幸福较之未革命之前 增进万倍 如近日泰西诸国之革命是也。革命而出于英雄也,一专制去而一专制来,虽或有去旧更新之实,究之出于权术者多,出于真自由者少。或则群雄角逐,战争无已,相持至数十百年,而后始底于一,幸福之得不足以偿其痛苦,中国历来之革命是也。”⁽⁵⁹⁾ 这里的“国民革命”其目的在于解放天下民众,并在革命胜利后建立共和制度,以保障天下民众的幸福;这里的“英雄革命”其目的在于以新的君主专制代替旧的君主专制,即使有去旧更新之实,亦不能在革命胜利后保障天下民众的幸福。因此,“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的结果是不相同的。“英雄革命”所导致的只能是古往今来专制王朝的交替,只有“国民革命”才能跳出这种历史的治乱循环。在他看来,以往中国历史上的革命,都是“英雄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因此,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没有革命,而是这些革命都具有历史的局限性,不能在革命胜利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保障天下民众的幸福。

陈天华进而论析了导致这两种类型革命的原因,把根本的原因归结为革命领袖人物的动机。他认为,这两种类型革命之所以目的与结果不同,就在于“英雄革命”是出于革命领袖人物的“功名心”,“国民革命”则是出于革命领袖人物的“责任心”。他指出“夫出于责任心者,功不必自己出,利不必自己居,目的苟达,则奉身而退,无所私焉;出于功名心者反是。”⁽⁶⁰⁾ 他以秦末农民大起义为例,进行了具体的历史分析。他说“秦末之革命,为国民革命乎?抑为英雄革命乎?其始也,殆为国民革命,教育未普及,程度不相等,野心家利用之,而其结果,遂至为英雄革命。”⁽⁶¹⁾ 陈胜、吴广发难,本是反对秦始皇的残暴统治,这是出于责任心,因而义军所指,曾无抵抗,未过数月而遍及天下。但由于当时未闻共和之说,仅存君主之制,所以秦末革命领袖人物皆有自为帝制之心,秦末灭而纷纷自立为王,以至出现刘、项相争,流无数国民之血。因此,他感叹地说“吾于是而知革命不可出于功名心,唯当出于责任心也。”⁽⁶²⁾

正是这样,陈天华希望自己所投身的反清革命,不再重演中国历史上的“英雄革命”,而应效法欧美,成为新式的“国民革命”。他得出结论说“中国今日而革命也,万不可蹈刘、项之覆辙;而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否则亡中国者革命之人也,而岂能遂其家天下之私心耶?夫人群,进化者也。吾诚不能以今日之文明革命苛责古人,而亦不愿今日仍有私人之革命,而无国民之革命。”⁽⁶³⁾ 他写《中国革命史论》一文,正是要以历史为革命党人提供一面镜子。可惜此文未及完成,他就蹈海而死,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为了提醒革命党人注重这一问题,陈天华在《绝命辞》中明确表示“革命之中,有置重于民族主义者,有置重于政治问题者。鄙人平日所主张,固重政治而轻民族,观于鄙人所著各书自明。”⁽⁶⁴⁾ 他所说的“固重政治而轻民族”,是指在“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间,重视“政治革命”;在“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之间,选择“国民革命”。这是陈天华的革命观的最后表达。

陈天华区分“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思想,孙中山是十分赞成的。陈天

华死后,孙中山对这一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1906年秋冬之交,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制订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首篇为《军政府宣言》,开篇即论同盟会反清革命与明末及太平天国反清革命之不同,认为两者之异,就在于明末及太平天国是“英雄革命”,而同盟会则是“国民革命”。孙中山指出“唯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⁶⁵⁾是年底,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大会上,孙中山又在演说中告诫革命党人:“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的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争不到手,宁可各据一方,定不相下,往往弄到分裂一二百年,还没有定局。今日中国,正是万国眈眈虎视的时候,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正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⁶⁶⁾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⁶⁷⁾这里的“平民革命”,也就是“国民革命”、“政治革命”,但“平民”二字则更鲜明地体现出革命为民众谋幸福的目的。

正是这样,革命派思想家开始对中国古代革命观念进行批评,主张用现代革命观念取代古代革命观念。1907年,发表于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上的《新世纪之革命》一文,就曾作过这样的比较“科学公理之发明,革命风潮之澎湃,实十九、二十世纪人类之特色也。此二者相乘相因,以行社会进化之公理。盖公理即革命所欲达之目的,而革命为求公理之作用。故舍公理无所谓为革命,舍革命无法以伸公理。昔之所谓革命,一时表面之更革而已,故其益不张,而弊端仍旧,多番更革,结果如一。请观由汤武以至于今,其有益于公理者何在?此等革命,仍旧世纪之革命,乃一时一事之革命,乃无进步之革命,乃图少数人权利之革命。若新世纪之革命则不然。凡不合于公理者皆革之,且革之不已,愈进愈归正当。故此乃刻刻进化之革命,乃图众人幸福之革命。至法兰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革除王位,宣布人权,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⁶⁸⁾这里的“旧世纪之革命”亦即“英雄革命”,这里的“新世纪之革命”亦即“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观念的提出,对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下层民众参与革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06年12月,由同盟会发动的以会党和工农群众为主体的浏醴萍大起义,就鲜明地以“国民革命”为其旗帜,起义军号称“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而在起义军以“中华民国政府”名义发布的《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中,不仅主张推翻清朝统治,而且提出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新的社会理想“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

虏 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 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 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 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 尤当研究新法 使地权与民平均 不致富者愈富 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 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 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能完全享受。”⁽⁶⁹⁾ 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革命”观念已开始向下层民间社会渗透与扩展,获得了广大下层民众的认同,并与实际的革命运动相结合。

由此可见,陈天华与孙中山区分“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对“国民革命”的认肯和对“英雄革命”的否定,体现了革命派思想家在力倡革命的同时,对革命的性质、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前途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国民革命”后来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1925年3月,重病中的孙中山留下遗嘱,强调“国民革命”为毕生志业之所在,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⁷⁰⁾ 继之而来的1925—1927年由国共两党共同发动的大革命,就是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因此,革命派思想家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的区分,构成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十分重要一环。

六、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继孙中山提出“社会革命”、陈天华与孙中山区分“英雄革命”与“国民革命”之后,同盟会中最激进的民主革命家和思想家朱执信又对“社会革命”作了进一步阐发,并对“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加以了明确区分。1906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等文,对有关“社会革命”诸问题作了最初的系统阐发。

朱执信指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质。“政治革命”在于人民大众反对君主专制制度,这也就是“国民革命”;“社会革命”则在于现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在性质上与“政治革命”并不相同。他说“凡政治革命之主体为平民,其客体为政府(广义);社会革命之主体为细民,其客体为豪右。”⁽⁷¹⁾ 他进而对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细民”和作为“社会革命”客体的“豪右”进行了具体说明,指出“平民、政府之义,今既为众所共喻,而豪右、细民者,则以译欧文 Bourgeois Proletarians 之二字,其用间有与中国文义殊者,不可不知也。日本于豪右译以资本家,或绅士。资本家所有资本,其为豪右,固不待言。然如运用资本之企业家之属,亦当入豪右中,故言资本家不足以包括一切。若言绅士,则更与中国义殊,不可袭用。故暂锡以此名。至于细民,则日本通译平民,或劳动阶级。平民之义,多对政府用之。复以译此,恐致错乱耳目。若劳动者之观念,则于中国自古甚狭,于农人等皆不函之,故亦难言适当。细民者,古义率指力役自养之人,故取以为译也。”⁽⁷²⁾ 因此,这里所讲的作为“社会革命”主体的“细民”,即无产阶级(Proletarians);作为“社会革命”客体的“豪右”,即资产阶级

(Bourgeois)。由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主体与客体不同,因而两者的性质当然相异。

朱执信又从现代社会经济生活入手,对“社会革命”的原因进行了考察。他认为“社会革命之原因,在社会经济组织之不完全也。凡自来之社会上革命,无不见其制度自起身者也。此必然之原因也。”⁽⁷³⁾在现代社会经济生活诸因素中,他把引发“社会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归结为无限制的竞争和绝对的私有财产制度,指出“今日一般社会革命原因中最普通而可以之代表一切者,则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权之制度也。”⁽⁷⁴⁾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隔,从而引发了“社会革命”。对此,他作了更细致的论析,指出“放任竞争,与贫富悬隔有必然之关系者也。抑不由放任竞争,固不得致贫富悬隔也。贫富悬隔,由资本跋扈;不放任竞争,则资本无由跋扈也。更从他方面以观,则无私有财产制,不能生贫富固也;有私有财产制,而不绝对容许之,加相当之限制,则资本亦无由跋扈。即于可独占之天然生产力,苟不许其私有,则资本之所以支配一切之权失矣。故必二者俱存,而后贫富悬隔之现象得起。言贫富悬隔,则决不能离此使之悬隔者。故言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而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为社会革命之原因,非过也。”⁽⁷⁵⁾在他看来,主张“社会革命”的社会主义,也正是基于此而来“今日之社会主义,盖由是制度而兴者也,因其制度之敝而后为之改革之计画者也。”⁽⁷⁶⁾因此,尽管社会主义主张者在理论上不尽相同,但“世之知社会主义而言之者,必归于社会贫富悬隔而起,此其言固无误也”⁽⁷⁷⁾。

通过对“社会革命”的性质与原因的论析,朱执信认为“社会革命”的目标,并不是重复历史上农民反抗运动的劫富济贫,而在于创造一种新的平等制度。他说“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⁷⁸⁾由此,他提出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中国前途论,则此决不可忽也。中国今日固不无贫富之分,而决不可以谓悬隔,以其不平不如欧美之甚,遂谓无为社会革命之必要,斯则天下之巨谬,无过焉者。当其未大不平时行社会革命,使其不平不得起,斯其功易举也。”⁽⁷⁹⁾在他看来,现时的中国虽有贫富之分,但尚未演进至贫富悬隔,因此在这时进行“社会革命”,防止出现欧美式的贫富悬隔,不仅十分必要,而且相对易行。

当然,朱执信也看到了“社会革命”的困难性,认为实行“社会革命”要比实行“政治革命”困难得多,这就在于“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殊科。政治革命者,第以对少数人夺其政权为目的耳,然则敌少而与者众也。社会革命,则富族先起为阻,而政府又阴与焉,务绝灭其根株,以谋其一己之安。有政权与有资财者合,则在下之贫民无以抗也。”⁽⁸⁰⁾因此,他认为实行“社会革命”需要有一批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坚持不懈奋斗的社会革命家,而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德国社会革命

家正是其榜样。正是这样,他写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介绍以马克思为代表的德国社会革命家的思想与实践。他在文中写道“社会的运动,以德意志为最,其成败之迹足为鉴者多。而其功,实马尔克(即马克思——引者注)、拉萨尔、必卑尔(即倍倍尔——引者注)等尸之。故不揣颛蒙,欲介绍之于我同胞。翔贖博洽,所未敢云。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⁸¹⁾正是从马克思的身上,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朱执信看到了“社会革命”的前景,主张以此为中国人实行“社会革命”的借鉴。

尽管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社会革命”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中处于边缘性位置,并未成为革命派思想家的共识,但朱执信还是提出了“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⁸²⁾的主张。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他对此作了专门阐发,力主“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有相利而无相害”⁽⁸³⁾。在他看来,“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的合理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从“社会革命”及于“政治革命”之影响看,“社会革命”保证了“政治革命”的政策,不受经济上少数有势力者的影响而动摇,始终保持“为大多数幸福计之政策”⁽⁸⁴⁾;从“政治革命”及于“社会革命”之影响看,“政治革命”准备了“社会革命”的条件,“已有政治革命者,社会革命后之完备组织,无为政治不良而被破坏之虑”⁽⁸⁵⁾。因此,他力主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把“社会革命”提上日程。朱执信的这一主张对当时的中国思想世界也产生了影响。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就提出了“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⁸⁶⁾的主张,这一点在本文第八节中将作进一步论述。

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与“社会革命”的凸显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马克思主义由发祥地西欧向世界各民族国家广泛传播的时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也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对中国革命派思想家产生了吸引力,他们开始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引入中国思想世界。特别是以孙中山为领袖的同盟会思想家,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来阐明他们所主张的“社会革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说,他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之前,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最积极的传播者。

孙中山在提出民生主义时,就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予以了关注和吸取。他对三民主义的思想来源曾作过这样的说明“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⁸⁷⁾在民生主义方面,他承认自己受到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很大影响。1906年,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大会上指出“这民生主义,是到十九世纪之下半期才盛行的”⁽⁸⁸⁾;“社会党所以倡民生主义,就是因贫富不均,想要设法挽救;这种人日兴月盛,遂变为一种很繁博的科学。”⁽⁸⁹⁾

也就在这一年 朱执信在《民报》发表长文《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其中第一部分题为《马尔克(Marx)》,以很大篇幅集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生平与《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基本内容。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作为标题在中国人所写的文章中出现,标志着中国先进思想家开始对马克思及其主义作专门的探讨和阐释。在文中,朱执信称马克思为“社会革命家”,把马克思视为“社会革命”的最重要的倡导者。正是这篇文章,使中国人开始具体了解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是开始了解作为这一理论内核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

朱执信在文中对《共产党宣言》作介绍时,十分重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马尔克之意,以为阶级斗争,自历史来,其胜者败必有所基。”⁽⁹⁰⁾对于《共产党宣言》的“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思想,他作了进一步的介绍和阐释:“故其《宣言》曰‘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斗争之陈迹乎。’取者与被取者相戕,而治者与被治者交争也,纷纷纭纭,不可卒纪。虽人文发展之世,亦习以谓常,莫之或讶,是殆亦不可逃者也。今日吾辈所处社会方若是,于此而不探之其本原以求正焉,则掠夺不去,压制不息,阶级之争,不变犹昔。则中级社会与下级社会改善调和之方,其又将以何而得求之也。”⁽⁹¹⁾在他看来,马克思创立阶级斗争学说,其目的正在于解放劳苦大众。他说“马尔克素欲以阶级斗争为手段,而救此蚩蚩将为饿殍之齐氓。”⁽⁹²⁾他还指出,《共产党宣言》的这些理论,直接对欧洲1848年革命产生了影响,“其所惠于法国者尤深,时际法国革命”;“既而德意志之劳动者亦感于马尔克之说,起而与富豪抗”⁽⁹³⁾。

朱执信又在文中对《资本论》作了介绍,认为马克思“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宗者,则《资本史》及《资本论》也”⁽⁹⁴⁾。这里的“《资本史》”,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剩余价值学说,他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向中国人作了说明:“譬有人日勤十二小时,而其六小时之劳动,已足以增物之价,如其所受之庸钱。余六时者,直无报而程功者也。反而观之,则资本家仅以劳动结果所增价之一部还与劳动者,而乾没其余,标之曰‘利润’。株主(即股东——引者注)辈分有之,是非实自劳动者所有中掠夺得之者耶。”⁽⁹⁵⁾在他看来,正是剩余价值学说,深刻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他指出“古之奴隶不知己之程功,何时为自为,何时为为主人者也,唯命是从。今之劳动者,则何以异于是也。马尔克此论,为社会学者所共尊,至今不衰。”⁽⁹⁶⁾“马尔克之谓资本基于掠夺,以论今之资本,真无毫发之不当也。”⁽⁹⁷⁾

朱执信认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特别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和剩余价值学说,更新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使得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他在《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中说:“顾自马尔克以来,学说皆变,渐趋实行,世称科学的社会主义(Scientific Socialism)。”⁽⁹⁸⁾这样一来,朱执信于西方近代革命观念之外,又发现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因而开始把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引入中国思想世界,进而对“社会革命”作出阐发。这使得中国人的革命观念又发

生了新变化 在卢梭、孟德斯鸠、约翰·穆勒、华盛顿的主张之外 还知道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朱执信的这一功劳 没有为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忘记。毛泽东曾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大”上回顾了这一段历史 感叹地说“朱执信是国民党员 这样看来 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⁹⁹⁾

随着“社会革命”的凸显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 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第一个范例的 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 开始进入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的视野 为他们所关注、所重视 并由他们向中国人作了最初的正面介绍。

1906 年 继朱执信之后 宋教仁在《民报》上发表《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 介绍马克思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文章开篇即论“社会革命” 明确地把“社会革命”看作无产者与资产者进行阶级斗争的产物 称“自社会革命之说出现于世界 而后人道胚胎 天理萌芽 将来世界之问题其于是焉解决乎? 世界者, 人类共有之世界也。观世界之人类 统计不下十五万万 然区别之 得形成为二大阶级: 掠夺阶级与被掠夺阶级是矣。换言之 即富绅 Bourgeois 与平民 Proletarians 之二种也。前之一种独占生产之机关 (后之) 一种以劳力而被其役使。资本与劳力乃生出佣金之一问题 其不平等之极 一若陟天堂 一若居地狱。不有以救之 世界人类其尽为乌狗矣。……阶级斗争之幕既开矣 旗鼓堂堂 为执戈立矛 而进于两阵之间。”⁽¹⁰⁰⁾ 他进而指出 只有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才为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马尔克 Karl Marx 之作《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 也 其末曰‘吾人之目的 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 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 盖平民所决者 唯铁锁耳 而所得者 则全世界也。’又曰‘万国劳动者其团结!’ 呜呼! 是可以观万国社会党之大主义矣。”⁽¹⁰¹⁾ 而第一国际 正是马克思寻求欧美各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产物。但在对待巴黎公社的态度上 马克思与英国工联主义者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他写道“英国者 马尔克尝亡命之地 而建筑劳动者运动之基础者也 其驱激烈的产业革命之劳动者而使走入万国劳动者同盟(即国际工人协会 又称第一国际——引者注) 当以此国为最甚矣。然英国国民有徒喜实行之癖 常不免流于姑息因循之弊。彼等始见夫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法国劳动者之败于巴黎暴动 Commune(即巴黎公社——引者注) 也 则喁喁然少倾向其颈焉 既而见夫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也 则恐怖战栗掩耳而走矣 于是其足遂渐远于万国劳动者同盟之激烈场 其口遂仅甘于社会改良主义之温和说。”⁽¹⁰²⁾ 这里的“万国劳动者同盟之发布赞同此事之宣言” 指马克思所写的总结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即他的名著《法兰西内战》。尽管这篇文章是宋教仁据日本刊物《社会主义研究》上的文章编译而成 但亦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关注。

1907 年 发表于无政府主义刊物《新世纪》上的《新世纪之革命》一文 更对巴黎公社革命作了专门介绍和高度赞扬 称“至法兰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 革除王位 宣布人权 乃为新世纪革命之纪元。至千八百七十一年 乃有平民

社会革命,由于社会主义鼓吹所致。虽其事未成,然于革命进化史中留一大纪念,亦足以将来社会革命之先导。”⁽¹⁰³⁾这篇文章的后面,专门附录了法国社会学家于峨(A. Girard)所记巴黎公社革命“巴里公民(即巴黎公社——引者注)之革命,其远因在社会集产主义之鼓吹,其近因则在普法战事之困迫。巴里之民忿怨政府之专横,集众示威以为诫。行政首领铁业 Thiers(即梯也尔——引者注)知之,惧有不利,决计剪民,下令撤去国民军之军械,军众大哗。三月十八日国民军与常备军接战,铁业以常备军逃于万岁邑(即凡尔赛——引者注)。由是巴里民军之议会乃成立,遂宣布巴里公民之独立,且劝告他邑仿行。二十六日公民会举执事七十五人。万岁邑政府图返巴里,以十万人来攻。四月二日两军遇于巴里东北,政府军败。五月二十一日,外军入巴里,巴里军力敌之,血战八日,死者三万五千人。五月二十九日,革命军乃不复振。军法裁判所遂肆行严酷手段,凭一言词、一疑状而杀人,并不讯问。妇人孺子之无故被杀者,不知凡几。以流血为乐,残酷万状。然此为人民留一大纪念,且以征实政府及显者之为民仇也。巴里公民革命之未成,亦有多故。一因革命之思想尚未普及;一因国民军拘守旧德,虽旧政府之财库,不肯取掠,不肯施以最强烈之手段,卒致使政府得养其余威,以倾覆之。呜呼!后来之革命者,亦可引为鉴矣!”⁽¹⁰⁴⁾这里对巴黎公社失败原因的论述,实际上是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总结的。

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及传播,使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对革命的理解,超越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而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涵。这些新的内涵,在辛亥革命十年后,随着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就由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边缘而移向中心,最终主导了中国现代革命观念,成为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最核心的内容。

八、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的引入与革命目标的变更

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伴随,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也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引入中国思想世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中国人对于这两大主义都是初步接触和了解,因而很难深入区分两者间的同异,往往混在一起加以引入和介绍。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承认,他们“于社会、共产二主义,均有所采”⁽¹⁰⁵⁾。上引《新世纪之革命》一文对巴黎公社的介绍,就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无政府主义者是革命的最积极的主张者。那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又被称为“虚无党”。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曾对“虚无党”下过一个定义:“虚无党何也?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¹⁰⁶⁾在这个定义中,无政府主义者自命为“革命之急先锋”。他们大声呼唤革命的风雷降临神州大地:“廿纪风尘,犬狼争至,四亿之人,殆无死地。有志之士,于是奋臂大呼曰:革命!革命!革命为图存之良药!革命为进化之利器!……望其革命风云之速起,于此沈沈殆死之大陆,演一种雄烈壮快之活剧也。”⁽¹⁰⁷⁾对于革命党人,他们更是予以赞扬和激励:“伟矣,烈矣,革命党之前途!其希望之大,当与

江海同流;其功业之伟,可供日月争耀。”⁽¹⁰⁸⁾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文献中,“革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不仅如此,无政府主义在革命手段上,也取极端态度,主张“暗杀手段诚革命之捷径”⁽¹⁰⁹⁾,认为“盖起革命之风潮,而速社会之进化者,暗杀也”⁽¹¹⁰⁾;“今日欲行无政府革命,必以暗杀为首务也”⁽¹¹¹⁾。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一些革命党人全力从事暗杀清政府大员的活动,以此为推动反清革命的重要方式。

对于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了不少论述。李石曾在1907年发表《革命》一文,对此作了专门阐发。他与朱执信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相类似,认为革命有“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两种类型,“政治革命”是转移国家政治权力乃至变更国家政治制度,“社会革命”则是实现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因此,反对满洲统治乃至推翻君主专制制度,亦只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但要完成“社会革命”,又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他写道“今之释革命,曰诛不肖政府,亦更新之意耳。今中国政府谁耶?满洲人也。故人恒以排满与革命为一事。排满诚革命之一端,而不足以尽革命。更思吾辈之革命,因其为满而排之耶?抑因其为皇而排之耶?若因其为满而排之,设皇帝非满人即不排之耶?若因其为皇而排之,则凡皇皆排之也。故与其言排满,不若言排皇。然则排皇遂足以尽革命耶?排皇不过政治革命,犹不足以尽革命。至社会革命始为完全之革命,即平等也,均贫富也,一言以毕之,使大众享平等幸福,去一切不公之事。然社会革命必自倾覆强权始,倾覆强权必自倾覆皇帝始。故曰:政治革命为权舆,社会革命为究竟。”⁽¹¹²⁾在这里,李石曾提出的“使大众享平等幸福”的“社会革命”,显然比“排满”的“民族革命”与“排皇”的“政治革命”具有更远大的目标。正是这样,他强调20世纪的中国革命者必须在革命目标上作出新的选择“吾其为少数人之利益而革命乎?吾其为众人之幸福而革命乎?”⁽¹¹³⁾在他看来,20世纪正是“社会革命”的时代,“社会革命”不仅超越了传统帝王的一己私利,而且超越了近代民族国家的一国利益,因而具有了世界意义。因此,“社会革命为二十世纪之革命,为全世界之革命”⁽¹¹⁴⁾。

无政府主义者之所以主张实行“社会革命”,就在于他们看到以往的革命,即使是“民权革命”、“国民革命”、“政治革命”,也没有能够解决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人类至于今日,失平等之权者,实占社会之多数”⁽¹¹⁵⁾。刘师培对这种种不平等现象进行了概括,归结为三点:一是政府之于人民的不平等,二是资本家之于佣工的不平等,三是强族之于弱族的不平等。他说“要而论之,以上凌下,政府之弊也。以富制贫,资本私有之弊也。以强凌弱,国家之弊也。唯其有政府,故仅利政府,不遭利及人民;唯其资本私有,故仅利一人,而不遭利及公众;唯其有国家,故仅利一国,而不遭利及世界。”⁽¹¹⁶⁾因此,无政府主义主张通过更彻底的“社会革命”,“实行人类天然的平等,消灭人为的不平等,颠覆一切统治之机关,破坏一切阶级社会及分业社会,合全世界之民为一大群,以谋人类完全之幸福”⁽¹¹⁷⁾。

在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看来,他们的革命主张与马克思主义一样,都以消灭不平等的“社会革命”为目标,也是一种社会主义。他们在东京成立了社会主义讲习会。其代表人物刘师培还为《共产党宣言》写了序言,其中虽指出了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思想分歧,但对《共产党宣言》仍持基本肯定态度,予以很高评价,认为“观此《宣言》所叙述,于欧洲社会变迁纤悉靡遗,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欲明欧洲资本制之发达,不可不研究斯编;复以古今社会变更均由阶级之相竞,则对于史学发明之功甚巨,讨论史编,亦不得不奉为圭臬。”⁽¹¹⁸⁾与之相联系,无政府主义者褚民谊把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社会主义相比较,强调社会主义比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具有更高的理想。他指出“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专凭公道真理,以图社会之进化。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以冀大同;无贫富,无尊卑,无贵贱,以冀平等;无政府,无法律,无纲常,以冀自由。其求幸福也,全世界人类之幸福,而非限于一国一种族也。故社会主义者,无自私自利也。吾敢断言曰:至公无私之主义也。”⁽¹¹⁹⁾因此,“夫社会主义,非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背驰者也,不过稍有异同耳。社会主义有民族主义之作用则为同,而无民族主义之自私则为异;有民权主义之效能则为同,而无民权主义之自利则为异。盖社会主义者,求世界人类自由平等幸福,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求一国一种族少数人之自由平等幸福也。”⁽¹²⁰⁾正是这样,他“专对于今中国一般欣道革命爱言革命者告,使彼知民族、民权二主义外,尚有义广理全至公无私之社会主义”⁽¹²¹⁾,希望“昔日之热心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增其热度,遂变而为热心于社会主义”⁽¹²²⁾。

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可以说是空想与理想的混和物。由于其空想性质,所以不能对实际革命运动起真正的指导作用;又由于其理想性质,所以能为实际革命运动提出更远的目标。正是这样,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对中国思想世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中国革命派思想家影响尤大。廖仲恺曾在《民报》上发表《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虚无党小史》等文,介绍无政府主义。章太炎在这一时期所写的《五无论》,主张“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的理想社会,典型地反映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影响。

九、简短的结语

从上述关于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与理论探讨中,可以清楚看出,中国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经历了历史性变化,实现了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正是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给中国人带来了新的理想与新的希望,从而使“革命”取代“维新”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清王朝的覆灭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形成中,既承继了中国古代革命观念的有生命力有影响力的内容,又引入了西方近代革命观念、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无政府主义革命理论,更有中国革命派思想家综合中西古今思

想资源所进行的融贯与创新 如邹容初步提出的中国民主革命纲领、孙中山确立的三民主义、陈天华主张的“国民革命”与“英雄革命”相区分、朱执信主张的“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相并行。与这种观念的转换相伴随,中国人向欧美学习近代革命经验,不仅以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为样板,而且引入了巴黎公社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因此,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形成中,不仅包含了反清的内容,也不仅包含了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容,还包含了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压迫的社会主义理想追求。正是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观念引导下所出现的辛亥革命,不仅在中国结束了持续二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奠定了新的共和国制度,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中国化,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辛亥革命后一百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社会历史变迁,实可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中国现代革命观念的形成中发现其思想根源。

注释:

- (1) 汪精卫《论革命之趋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77年,第524页。
- (2) [54][55] 卢信《革命真理——敬告中国人》,《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26、27页。
- (3) 徐复观《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儒家政治思想与自由民主人权》,台湾八十年代出版社,1979年,第118页。
- (4)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598页。这段引文出自该书附录二《百个现代政治术语词意汇编》,这个附录由高超群整理,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核对、编排。
- (5) 章太炎《正仇满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94页。
- (6)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203页。
- (7) [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邹容《革命军》,中华书局,1958年,第2、1—2、24、35、35、36、1、23—24、2—3、3—4、36、36、34、35、35、35、35页。
- (8) 陈天华《警世钟》,《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9页。
- (9) 陈天华《狮子吼》,《陈天华集》,第117—118页。
- (10) 胡汉民《就土耳其革命告我国军人》,《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560页。
- (11) 孙中山《在檀香山正埠荷梯厘街戏院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226页。
- (12) 孙中山《驳保皇报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34页。
- (13) [87] 孙中山《中国革命史》,《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59—60、60页。
- (14) 殷子衡《狱中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6页。
- (15) 方孝纯《辛亥首义之片段回忆》,《辛亥首义回忆录》第3辑,第101页。
- (16) [22] 秦力山《革命箴言》,《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第47、28—29页。
- (17) 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3页。
- (18) [19] 梁启超《释革》,《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第242、243页。
- (20) 秦力山《革命箴言》,《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册,第28页。引文中“英语之反叛为 Puno-popy”原文如此。
- (21) [86][112][113][114] 李石曾《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67、167、167、169、168页。

23) 康有为《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摘录)》,《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475页。

(24) 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第42—43页。

(41) [42] 章士钊《读〈革命军〉》,《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685、684页。

(43) 《孙逸仙与白浪庵滔天之革命谈》,《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751页。该文没有作者署名。

(44) 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9页。

(45) 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46) 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1页。

(47) 孙中山《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0页。

(48) 孙中山《东京军事训练班誓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4页。

(49) [50] [51]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第78、78、78页。

(52) [66] [67] [88] [89]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6、82—83、82、83、84页。

(53) 孙中山《〈民报〉发刊词》,《孙中山选集》第75—76页。

(56) 陈天华《绝命辞》,《陈天华集》第232—233页。

(57) 杨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第615页。

(58)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2] [83] [84] [85] [98] 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朱执信集》上集,中华书局,1979年,第64、60、60、56、56、57—58、56、57、58、58、54、69、69、69、55页。

(59) [60] [61] [62] [63] [64] 陈天华《中国革命史论》,《陈天华集》第220、221、220、221、222、232页。

(65) 孙中山《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第77页。

(68) [103] [104] 《新世纪之革命》,《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下册,三联书店,1963年,第976、976、977—978页。该文没有作者署名。

(69) 引自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5页。

(70) 孙中山《遗嘱》,《孙中山选集》,第994页。

(80) [81]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朱执信集》上集,第8、10、11、11—12、14—15、15、16、17、17、20页。

(99)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90页。

(100) 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集》第1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44页。引文中括号内的字为《宋教仁集》编者所补。

(101) [102] 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宋教仁集》第1册,第44、45—46页。

(105) [115] [116] [117] 刘师培《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85、79、84、85页。

(106) 金一《〈自由血〉绪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53页。

(107) [108] [109] 燕喜《〈无政府主义〉序》,《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23、24、24页。

(110) 褚民谊《普及革命》,《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87页。

(111) 公权《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纪事》,《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2页。

(118) 刘师培《〈共产党宣言〉序》,《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37—138页。

(119) [120] [121] [122] 褚民谊《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册,第176、173、172、172页。

责任编辑:力 昭)

Condensed paperACADEMICS
No.7 Jul.2011
General No.158

Li Weiwu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Abstract: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transformed from the ancient one to the modern one ,which therefore laid an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Qing Dynasty.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vitality and the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but also absorbed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Marxian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revolutionary anarchic ideas. Some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integrating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oughts with Western ones ,ancient with modern ,brought forth the new ideas. For instance Zou Rong put forward the program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Sun Yat - sen establishe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hen Tianhua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Hero Revolution; Zhu Zhixin proposed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These thoughts not only embodied anti - Manchuism ideas and ideas against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but also indicated the pursuit of socialism while fighting against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Key words: the 1911 Revolution;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Tangwu Revolution; na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social revolution; Zou Rong; Sun Yat - sen; Chen Tianhua; Zhu Zhixin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1901 to 1910 ,was a preparatory period for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main theme of last ten years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reform” ,where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revolution” . The foreground of revolutionary idea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was directly linked to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during this period. Endowed with new connotations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never had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 brought Chinese people new ideal and hope ,changed the main theme of that era and led to the outbreak of the 1911 Revolution. This paper will have a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into the main aspects and basic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so as to reveal the connotations and significance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scrutinize the profound impacts the 1911 Revolution cast on the world of Chinese thought.

I . The Revival of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

The word “*ge ming*” ,appeared in the Pre – Qin books and records ,originally refers to reform through intense form to achieve the transfer of state’ s political power conferred by the will of heaven from the older ruler to the new rulers. The transfer of state’ s political power was manifested in the form of dynastic change in Chinese ancient society. In *Yi Zhuan* , “*ge*” and “*ming*” were firstly combined as the word “*ge ming*” shown in “Heaven and earth undergo their changes and the four seasons complete their functions. Tang changed the appointment (of the line of Hsi to the throne) ,and Wu (that of the line of Sha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ill of) Heaven and in response to (the wishes of) men”. Taking sages like King Tang and King Wu as typical examples ,this book justified the achievement of dynastic changes through fierce revolution. Pre – Qin Confucian thinkers had further contemplated and argued about the issue so as to form complete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In particular ,Mencius thoughts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which are later regarded as affirming revolutionary rights of politics and people’ s revenge rights for the ruler or the rights of changing the rulers ,specifically elucidated and further deepened the revolutionary ideas.

These ancient revolutionary ideas have influenced Chinese people for two thousand years and were still the mai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ople about revolut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In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entered China’ s political stage and ideological stage ,and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 and highly advocated them. They sought to revive this ancient idea in the new era so as to awake the people to devote to revolution. Especially those revolutionists who were influenced by Confucianism and had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 Han nationality not only advocat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ribes in the east” and denied the legitimacy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also promoted the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called for a revolutionary way to achieve “national revolution” ,which was opposing Man and reviving Han. This “national revolution” was actually a dynastic change where state’ s political power was transferred from Man rulers to Han rulers ,which was the original understanding about revolution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Som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like Zou Rong ,Chen Tianhua ,Hu Hanmin and even Sun Yat – sen who shared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also could not refuse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when propagandizing revolution. As a result ,although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did not possess modern factors ,it became the source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II . The Introduction to Modern Western Revolutionary Idea

Despite the great influence of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they were difficult to adapt to new era and impossible to become the ideological flag of Chinese

revolu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Due to the fact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 found its way into the world of Chinese thought ,drew much attention and produced great impact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A rather symbolic example was that in the beginning Chinese people connected “*ge ming*” in Chinese with “revolution” in English ,so they translated “*ge ming*” into “revolution” and hence endowed the word with new meanings. Originally , “*ge ming*” refers to dynastic change of ancient China ,but now refers to the reform of social system. On that basis ,the anarchic thinker Li Shi had once denied the fact that China had “revolution”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said “The word ‘revolution’ came from Western language.” Under such environment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became more prominent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main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people about revolution.

The introduction to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facilitated revolutionary thinkers’ deep understanding about revolution. In *Revolutionary Motto* ,Qin Lisan pointed out that the word “revolution” included broad and narrow meanings. Broadly speaking, “revolution” referred to reasonable change ,breaking with the old and establishing the new ,or the new replacing the old. Narrowly speaking, “revolution” referred to the founding of a democratic republic or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in order to put an end to monopoly of state’s political power from the national system ,which was known as “civil rights revolution” or “political revolution”. Consequently ,th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understanding about revolution was far beyond the ancient Chinese “Tang Wu Revolution” and possessed modern elements of Western bourgeois revolution. It was the critical point at which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shifted from the ancient form to the modern one.

III. Preliminary Advance of the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ogram

In 1903 ,revolutionary thinker Zou Rong’s masterpiece *Revolutionary Army* was published in Shanghai ,resulting in revolutionary trend of thoughts in China. The revolution Zou Rong called for in the book referred to both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democratic revolution”. In the book ,he elaborated the purpose ,basis ,nature , theory and prospect of anti – Manchuiism revolution through absorbing and propagandizing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analyzing Chinese actual condition. Zou Rong believed that anti – Qing revolutionary had dual purposes: one was overthrowing two – hundred – year Manchu rule in China and the other terminating thousand – year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The basis of revolution not only was against the internal oppression and exploitation and external loss of rights and sale of country of the Qing rulers ,but also restored the rights of equality and freedom each person is born with. Therefore ,following British ,American and French revolutions in the 17 – 19 century ,instead of ancient China’s “Tang Wu revolution” ,this revolution was carried

out under the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Western 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oughts of Rousseau, Montesquieu and John Muller, Washington, which were regarded as its theoretical basis. Zou Rong designed politically new China after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 stressing that new China should abandon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and a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conversely, it must be a people-centered democratic republic.

Hence Zou Rong's *Revolutionary Army*, preliminarily proposing a program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was essential to the transference from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to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ones, and the shift of emphasis from "national revolution" to "democratic revolution".

IV. The Advanc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It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A shortage in Zou Rong's *Revolutionary Army* was that universal human rights were considered revolutionary basis, and however, livelihood of the majority of people from the lower classes wa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and their particular revolution requirements were ignored. It was Sun Yat-sen, the leader of Chinese revolution, who highlighted livelihood in the program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n put forward "social revolution", which incorporated "national revolution",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to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In 1905, Sun Yat-sen founded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whose basic program was to "drive out the Manchus, restore the Chinese sovereignty, create the Republic and equalize landownership". This program could be clearly summarized as "nationalism (*minzhuzhuyi*)", "the principle of democracy" (*minzhuzhuyi*) and "the principle of the people's livelihood (*minzhuzhuyi*)".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manifested the overall goal of his revolution and reflected his revolutionary ideal and pursuit. Thanks to it,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had been further developed and had a more complete connotation and a long-term goal. Just as Sun Yat-sen said "The purpose of our revolution is to seek happiness for all beings; we need national revolution because we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monarchy of a small number of Manchu people; we need political revolution because we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monarchy of the king; we need social revolution because we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 monarchy of a few rich people. Therefore, we intend to achieve them. After realizing three goals, our China will become the perfect state." So Sun Yat-sen put forward "na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and incorporated these revolutionary ideas as a unified revolutionary purpose. Here "political revolution" was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following revolutionary thinkers preferred to express "democratic revolution" with "political revolution".

Sun Yat-sen's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

ideas developed step by step and were gradually enriched from “national revolu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to “social revolu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highlighted “national revolution” gradually gave way to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thinkers’ emphasis on people’s livelihood and concern about “social revolution” forced them to turn their attention to Socialism and Marxism. At this time, Marxism began to spread in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China.

V.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ero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With the complete advance of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revolutionary thinkers began to reflect ongoing anti-Manchuism revolution, and consciously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their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Ancient Chinese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In 1905 the revolutionary thinker Chen Tianhua published *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in which he analyzed revolutions in history and in reality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revolutions were different in nature and could be classified into “hero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National revolution” aimed at liberating people in the world and establishing the Republic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people’s well-being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while “hero revolution” aimed at replacing the old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with the new one. Though “hero revolution” might abolish the old, it could not guarantee people’s well-being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revolution. Hence, “hero revolution” only led to the alternation of autocratic dynasties. “National revolution” alone may jump out of chaotic historical cycle. In his view the revolutions in the past in Chinese history belonged to “hero revolution” instead of “national revolution”. Therefore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re were no revol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se revolutions had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could not change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so as to guarantee the people’s well-being after the victory of revolution. Chen Tianhua hoped the anti-Manchuism revolution he was dedicated to would not repeat “hero revolution”, on the contrary, should follow the example of Europe and America and become new “national revolution”.

Sun Yat-sen was in favor of Chen Tianhua’s viewpoint and formulated it. In 1906 Huang Xing, Zhang Taiyan and Sun Yat-sen drew up *Revolutionary Strategy*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The opening chapter discuss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anti-Manchuism revolution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and anti-Manchuism revolution of Ming Dynasty and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former is national revolution, while the latter is hero revolution”.

“National revolution” became a crucial concept, which had a profound impact upon the course of 20th century Chinese history. The Revolution in 1925 – 1927 joint-

ly launched by the two parties was undertaken under the flag of “national revolution”. Thu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ero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is critical for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VI.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1906 the revolutionary thinker Zhu Zhixin published some articles such as *The Biography of the German Social Revolutionaries* and *On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which expounded “social revolution” proposed by Sun Yat - sen and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In Zhu Zhixin’s view, the subject of “social revolution”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Proletarians” in English, while the object of “social revolution” could be interpreted as “Bourgeois” in English. Therefore,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had different nature. “political revolution” meant that people opposed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which was also called “national revolution”, while “social revolution” meant that modern proletariats struggled against the capitalist system.

Zhu Zhixin thought that the reason of “social revolution” lay in the imperfection of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especially unrestricted competition and absolute private property system, which resulted in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sharp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proletariats and the bourgeois. So the goal of “social revolution” was to create a new system of equality. In his eyes, there was stil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 present China, but it did not yet evolve to the polarization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Hence it was necessary and relatively feasible to carry out “social revolution” in order to prevent European and American hanging compartment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Thus he advocated “the parallel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VII. The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Connected with “social revolution”, revolutionary thinkers started to introduce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into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China. The thinkers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led by Sun Yat - sen became the most active disseminators who propagandized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before the appearance of Chinese Marxists.

The first section of Zhu Zhixin’s *The Biography of the German Social Revolutionaries* was entitled “Marx” focusing on Marx’s life and the basic content of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Das Kapital*.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Marx as the title could be found in the articles in Chinese. In the text Zhu Zhixin labeled Marx as “social revolutionist”, regarded Marx as the most important advocate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introduced the core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 the class conflict theory and the doc-

trine of surplus value. He thought that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renewed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made utopian socialism become science ,which was worthwhile for Chinese revolution.

The introduction to and spread of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made the understanding of revolutionary thinkers about revolution go beyond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have been granted with a more profound connotation.

VIII. The Introduction to Anarchic Revolutionary Theory

Accompanied by Marxist revolutionary theory ,anarchic revolutionary theory was also introduced into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China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At that time the anarchists were the most active proponents of the revolution.

Similar to Zhu Zhixin ,anarchic thinker Li Shi ,once thought that the revolution included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social revolution”. “Political revolution” was to transfer state’s political power and even change state’s political system ,while “social revolution” was to realize the ideal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is born to be equal. Therefore ,anti - Manchuism and even overthrowing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were only “political revolution” instead of “social revolution”. From the point view of anarchists ,the revolutions in the past like “democratic revolution” , “political revolution”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did not solve social inequality. So they proposed that more complete “social revolution” should subvert all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 ,destroy all societies with all classes ,and achieve the equality of all mankind in order to seek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At that time anarchists thought that their revolutionary idea just like Marxism was also socialism. They set up a socialist workshop in Tokyo. The representative Liu Shipai has written the preface of *Communist Manifesto* ,held positive attitude and sung highly of it.

Anarchic revolutionary theory is a mixture of fantasy and the ideal. Because of its utopian nature ,it can not guide the actu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Besides ,due to its ideal nature ,it can put forward a high goal for the actual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onsequently ,anarchism had great effect on the ideological world of China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especially on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People’s Journal* of the Revolutionary Alliance has published many articles in order to introduce anarchism.

IX. Conclusion

From the above discussions about the history and theoretical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we can see clearly that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underwent historical change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bringing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ancient forms to the modern ones.

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not only inherited the

vitality and the influential elements of the ancient revolutionary ideas but also introduced Western modern revolutionary ideas ,Marxist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anarchic revolutionary ideas. Chinese revolutionary thinkers integrated both Chinese with Western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cient and modern ,and brought forth the new ideas. For example Zou Rong put forward the program of Chinese democratic revolution; Sun Yat – sen established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Chen Tianhua mad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Hero Revolution; Zhu Zhixin proposed the coexistence of social revolution and political revolution. These thoughts included not only anti – Manchuism ideas and ideas against absolute monarchy system but also the pursuit of socialist ideas against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and oppression.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brought Chinese people new ideals and hope just because of this. And “revolution” became the theme of the era which replaced “reform”. These ideas lai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outbreak of the 1911 Revolution and the complete collapse of Qing Dynast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se revolutionary ideas ,the 1911 Revolution not only put an end to feudal social system , established the system of New Republic but also opened the way to spread ,develop and sinicize Marxism and the way to establish socialist system in China. The tremendous social and historical changes which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1911 Revolution resul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sources which were rooted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revolutionary ideas during the decade before the 1911 Revolution.

(*Translator: Yu Yongfang*)
Wuhan University

Zhang Yunyi

Marx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11 Revolution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occurred from the October Revolution of Soviet Union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Marxism and its founder’s name ,however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long before this times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limitations in scope and content. Bourgeois Revolutionaries presented and promoted Marxism to build an ideological groundwork during the Revolution ,which played a positive effect at a certain degree for Marxism to sweep the whole country in its spreading history. In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Revolution , reviewing and reflecting on this history ,there is very important referenced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urrently.